

论抗战时期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

李金铮 邓 红

内容提要 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时间最久的|次著名调查。与三四十年代其他的农村调查相比,颇具自己的特色。它是在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张闻天“行动上的整风”。其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的政策法令”,具有强烈的政策服务性质。调查对象是以典型区域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为指导重点调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具体调查过程中,“不怕麻烦”,既注重利用地方党政权力的权威资源,又采取了调查会、个别谈话等有效的调查方法。最后通过分析调查资料,“抽出|般原则”,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等大胆论断,既实现了服务革命政策的目的,又是|种更为深刻的超越。

关键词 张闻天 农村调查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革命

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社会调查兴起较晚。旧中国时期,农村调查始于1920年代初,三十年代达致高潮,四十年代仍在继续。参与调查者,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学者个人、革命家,也有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还有乡村建设团体、政府机关。这些调查有的对当时的乡村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有的对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有的为外国侵华势力提供了情报。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07BDJ008)、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革命权力与民间社会》(06JA770022)成果。

时至今日,这些调查又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珍贵文献,也成为社会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源头。我们认为,除了将之用于学术研究以外,还应就调查本身进行必要的清理和总结。迄今,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侯建新、陶诚、曹幸穗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调查做过概略介绍^①,内山雅生对日本满铁调查尤其是华北农村调查做过述评^②,盛邦跃对卜凯的农村调查提出了新的见解^③,周大鸣对毛泽东的江西农村调查做过探讨。^④然就总体而言,以上论著尚嫌粗疏。一是除了满铁调查之外,对其他有影响的农村调查鲜见个案研究;二是对共产党的农村调查,除了毛泽东,很少关注其他调查;三是没有从调查本身的视角对调查宗旨、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价值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四是即便是个案研究,由于缺乏与其他农村调查的比较意识,很难凸显其特点。基于此种想法,笔者拟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农村调查进行系列研究。本文所论抗战时期张闻天领导的“延安农村调查团”的晋陕农村调查^⑤,就是一个尝试。

-
- ① 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侯建新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曹幸穗:《民国时期农业调查资料的评价与利用》,《古今农业》1999年第3期。
 - ② 内山雅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和实地调查之原委》,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468-475页。
 - ③ 盛邦跃:《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学海》2001年第2期。
 - ④ 周大鸣:《田野工作的情感——兼论毛泽东早期调查的田野价值》,《思想战线》2002年第4期。
 - ⑤ 此次调查已有文章做过研究,如牛崇辉等的《略论张闻天在晋绥边区兴县的农村调查及其贡献》(载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版),但作者没有将之与其他农村调查进行比较,因而很难显示其特点和地位;更没有从社会调查学角度,对农村调查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一 “行动上的整风”

任何社会调查的发起,都有其背景和缘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调查热,就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衰败、政治斗争的日益激烈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背景之下,关注农村、改革农村和复兴农村已成为社会各界的主流意识。

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则有其革命的政治斗争背景,是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为了寻求暴力革命的理论依据,为了验证革命政策实施的效果,也为了纠正“左”右倾的教条主义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始终重视农村调查。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①1931年4月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②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在江西根据地的兴国、寻乌等县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

张闻天主持的农村调查,同样有共产党革命的政治斗争背景,正如曾参加此次调查的马洪所说的:“这次调查就是在中央号召整风这样一个总的背景下进行的。”^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③ 《张闻天晋陕调查50周年座谈会纪要》,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0页。

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挖掘“左”右倾错误的根源,为了统一党的思想和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120余名高级干部在延安进行整风学习。整风运动的最主要的一项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央特别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性,首先出版了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一书。毛在此书的序言和跋中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①当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又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②随后8月,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2页。

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①与此同时,中央又颁布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在晋察冀边区、香港、重庆、延安分设第一、二、三、四分局。规定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党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专任收集该区域内敌、友、我各种具体详细材料加以研究,编成材料书籍与总结性文件,成为该局委工作之助手;并责成各局委将所得材料供给中央调查研究局。^②根据以上决定,从中央到地方都先后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张闻天主持的晋陕调查,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时间长、后果惨。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不仅在会上承认错误,还提出“补课”要求,“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③为了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的不足,他请求离开中央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以求“行动上的整风”。^④这一请求,得到中央的批准。他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出发调查。对张闻天的这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723页。

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年),第724-725页。

③ 刘英:《我对晋陕调查的回忆》,《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411页。

④ 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组认为:“过去有人说他出去调查是为了躲风,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见《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编后记,第432页。

一心态,他的夫人刘英,也是这次调查的参与者说:“整风中他深感自己对农村了解不够,因为他过去在国外过,搞文学多,后来在领导的上层多,而对下面实际了解得少。他说外国的东西或许我比毛泽东了解的多些,而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比我了解的多。因此认为需要去补课,主动提出要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而且准备做长时间的调查。”^①社会学者罗红光认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政府时期,为了给日后的土地改革探索理论依据,实现对生产资料的重新配置,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42年派出了以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为首的五人考察小组,组成了杨家沟、绥德等地的调查团。”^②这一判断恐与事实不完全相符。

张闻天(当时化名张晋西)领导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成员共9人,包括张的夫人刘英,中央党务研究室的雍文涛、薛光军,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曾彦修,中央财委的尚明、徐羽,中央研究院的马洪、许大远、薛一平。从调查行程与调查内容来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陕北神府县调查(2月18日—4月12日):1942年1月26日从延安出发,本来预定到晋西北调查,但在东渡黄河时遇到日军在河东进行扫荡,于是又折返陕北,首先进行神府县调查,整理出《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第二阶段为晋西北兴县调查(4月22日—9月10日),整理出《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大纲)以及其他13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第三阶段为陕北米脂县调查(9月26日—12月2日)。先是调查杨家沟村,整理出《杨家沟地主调查》以及刘家峁、高庙山二村地主的调查。然后在米脂城内调查。第四阶段为陕北绥德调查(1942

① 《张闻天晋陕调查50周年座谈会纪要》,《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427页。

② 罗红光:《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年12月10日—1943年2月24日)。先是在西川、双湖峪市镇乡调查,而后调查绥德市商业。调查尚未结束时,张闻天接到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遂于3月3日返回延安,其他成员在4、5月返回。^①

这次调查,延续一年零两个多月,是此前共产党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村调查。而我们最熟悉的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不过用了十多天、一个星期的时间。其他有影响的实地调查,有的时间较长,如李景汉主持的定县调查费时10年,卜凯主持的7省17处调查4年余,同样是他主持的22省168个地区调查9年,日本满铁主持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4年。其他调查多不超过半年,如陈翰笙主持的无锡、保定两处调查都是两三个月,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六省农村调查都不及2月,更多的调查是一两个月。相比之下,晋陕农村调查的时间算是较长的。

二 “检查我们的政策法令”

任何社会调查,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张闻天指出:“在开始调查前,应弄清楚调查的目的,即要调查的是什么事情。根据调查材料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②以上所谓“行动上的整风”,仅为我们提供了晋陕调查的政治背景和缘由,尚未深入触及此次调查的宗旨、目的及其内容。

二三十年代的农村调查主要分为认知型和改造型两类,前者以认识乡村或证明某一理论为目标,重在描述事实,为人们提

^① 张闻天:《调查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48-395页,编后记第432页。

^②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1943年3月27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41页。

供真实而详尽的田野报告和有限的理论分析^①；而后者则主要不在描述事实本身，而是从中发现问题，提出改革方案，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主持南阳农村调查的冯子岗对此有精辟的解释：“农村社会调查有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作为复兴农村底根据，另一种是当做学理底研究。所以，无论是学者要想研究农村，或负有复兴农村使命的机关要想计划改良农村，皆非先行精密的调查不可。”^②

外国学者的调查，偏于前一类型。卜凯就是如此，他主持的1921—1925年7省17处的调查，是为了“使西方人知道中国的情况”。^③1929—1933年的22省、168个地区的调查，也是“汇集中国农业知识，俾世界各国关怀中国福利之人士，得知中国土地利用、食粮及人口之概况。”^④尽管如此，大多调查仍有改良农村的意蕴。如1922年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戴乐仁主持的4省240个村落的调查，“乃望能供给一种经济背景于中国农民，使其得享较美的生活，使其明白何种情形为最完满的，何种方法方针诱导农民为最有帮助的等”。^⑤1926年成都大学经济系教授布朗主持的峨眉山农村调查，也是“欲帮助改进该省的农业，第一个步骤是‘考察’，以察视现在的状况，待他们田区一切事情……都明白了以后，我们方能有改良方法之建议，方能令其耕作有进步及向上的根据”。^⑥

① 人类学家多持此种意见，强调田野工作的“中立”、分离和漠不关心。日本学者中根千枝说：田野工作方法“与其说是与社会学者接近还不如说与生物学者、动物学者这样的科学研究方法更为接近。”（中根千枝：《田野工作的意义》，《思想战线》2001年第1期，第74页。）

② 冯子岗等：《南阳农村社会调查报告》，黎明书局1934年版，引言。

③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65—566页。

④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年版，第234—236页。

⑤ 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北平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印，第3页。

⑥ 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28页。

即使是卜凯主持的调查,对农家经济的相关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认为租额“应当照现额减少五分之一,才合公道。”“低利息的流通金融,确是今日中国农人的急切需要之一。”“进步的交通,流动的金融,与良好的市场,可以使农人的出产物、数量增多而品质渐好”。^①可见,即便作为旁观者的外国学者,纯粹学理的调查也是几乎不存在的。

至于中国学者的调查,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强调社会调查的学理意义,认为只有社会改良家或社会哲学家才可提出改良社会的方略,而社会科学家便不应采取这样的态度,其任务是忠实地研究实在的情形,把结果报告给大众,而不能袒护或鼓吹任何方策。^②但事实上,只是说说而已,在外强欺凌、中国落后的刺激下,绝大多数调查为改造型,融入了强烈的民族情感。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吴文藻就认为:“社会调查,是服务家的观点,主旨不在认识社会,而在改良社会,注重社会问题的诊断。”^③费孝通也坦言,在解放前,“推动我去调查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救亡问题,敌人已经踏上了我们的土地,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这也就决定了我们调查研究的题目”。^④农村调查实践最为丰富的李景汉也认为:“社会调查固然是学理的研究,而主要的目的是实用。换句话说,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乃是为改良社会而调查。”^⑤

还有一些学者的调查,虽也属于改造型,但已带有强烈的政治

①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562-563页。

② 陶孟和:《社会研究的困难》,1930年1-6月,转引自阎明:《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③ 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社会学刊》第5卷第1期,1936年1月。

④ 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⑤ 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星云堂书店1933年版,第12页。

意味。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翰笙,为中共秘密党员,在苏区土地革命的影响下,主张对农村进行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目的即是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农村经济全面崩溃的根本原因以及土地革命的必然性,总归就是为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提供依据。^①至于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则完全是为了制定革命斗争策略而进行的,“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②

晋陕调查,也显示了浓厚的政策服务色彩,与陈翰笙、毛泽东的调查思想有明显的继承性。张闻天指出:“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这正像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各种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决定作战的命令。”^③但问题恰恰是,“现在我们所做的所喊的是离老百姓太远了……群众所了解的所想的,与我们所了解的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许多同志在机关内忙的很,政府、群众团体经常开会,但问题解决不了。”有鉴于此,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去调查了解群众生活情况。”“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我们的政策法规。”“要真正的了解我们政策法规执行的情形,必须深入到自然村里去。”“只要我们把老百姓的情形了解清楚,那么我们的政策及办法,就会更加实际。”^④

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调查哪些内容才能有效地检验党的政

① 孙晓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与农村复兴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 84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1 页;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1936 年 2 月,《〈中国农村〉论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0-411 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21 页。

③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 329-330 页。

④ 闻天:《神府经验调查谈》,《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 292-293 页。

策法令？

刘英对此做了高度概括：“这次调查有自己的重点，就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中检验我党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提出调整、改善的意见。”^①马洪也总结道：“这次调查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查，可以说在此之前党史上还很少有过对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如此系统的调查。调查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总的精神，就是非常注意生产力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注重考察当时生产力的代表是什么人？是哪一个阶层？是哪些人物？闻天同志很注重这个问题。因为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考察生产力的代表，闻天同志注重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研究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如何更快地发展生产力。”^②

事实的确如此。张闻天指出：“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把农村的阶级关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主义不同，就是它是以阶级为出发点的。我们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是以阶级为出发点的。所以要把复杂的阶级关系搞清楚。”但是，“过去我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查太少，即使有，也是很零碎的。而大部分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由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的全面调查太少了，这是过去调查研究的最大缺点，特别是生产力太少了”；“显然的，没有这种社会生产状况的调查研究，任何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③为此，他提出：“各级领导机关与领导者，必须首先熟知当地民众的生活情形，熟知生产上的一切问题，熟知各阶级间的关系，了解各阶级间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明确知道自己是站在什么

① 刘英：《我对晋陕调查的回忆》，《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413页。

② 《张闻天晋陕调查50周年座谈会纪要》，《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420、428页。

③ 张闻天：《神府经验调查谈》，《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292-293、334页。

阶级的立场之上,斗争应该向着什么阶级进行。”不仅如此,他还指出调查的具体项目:“如果我们在农村中工作的同志,都能调查清楚土地的种类,各种土地的质量,一垧地有好大,每垧地需要好多布袋粪,好多种子,需要几多人工、牛工来耕种、锄草、收割,何时耕、何时种、何时锄、何时收割,每垧地能打多少粮食等等,以及谁是地主,谁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谁是二流子,调查清楚他们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如租佃关系、借贷关系、劳动互助关系等等,以及他们间的各种斗争形式等等问题,那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①翻检晋陕调查的成果可以看出,其调查内容与张闻天的观点是吻合的。

与此相比,职业社会学家多把自然条件、生产技术、农业经营、人口家庭、收支消费作为主要调查内容,很少关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理论问题。如卜凯把农业生产单位的收支状况、技术因素作为调查的中心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薛暮桥所批评的:“他们因忽视理论,结果往往陷于支离破碎,找不到问题底中心……结果除掉证明早已有目共睹的‘贫困’‘破产’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说明。”^②

在确定调查内容之后,还要选择调查区域。毛泽东一直主张典型调查原则^③。1941年8月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也指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

①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34-336页。

② 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34年10月,《〈中国农村〉论文选》,第4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一典型。”^①毛泽东和中央的典型调查理论影响下,张闻天也提出:“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经常的保持同实际、同群众的联系,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②从这种典型研究所得出的规律性,对于同类事物却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成为了解同类事物的指导原则。”^③之所以如此,他认为:“我们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物都一件件调查研究清楚,而且事实上也无此必要。我们的办法,就是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比如我们调查边区的农村,我们不必调查边区的每一个农村,我们只要调查一些典型的农村就可以了,川地的农村与山地的农村,中心地区的农村与边境地区的农村,同姓的‘父子村’与异姓的杂居村。如果能够真正把几类典型的村子调查清楚了,那对于边区的农村也就能得到具体的了解,这正像我们对于人体生理只要解剖几个人的身体就可以了解,不必把所有的人都加以解剖一样。解剖所有的人不但不必要,而且也是不可能的。”^④在这一问题上,它与三四十年代的其他农村调查大体是一致的。

三 “要不怕麻烦”

所有调查的目标设计,都要通过调查实践即借助有效的调查方法来完成。张闻天对此有充分的认识:“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切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只要我们肯动眼、动口、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年),第722-723页。

②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33页。

③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37页。

④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36页。

动耳、动手、动脚，我们就会在这方面得到成绩。”^①他调查神府贺家川后说：“调查研究，就要不怕麻烦”^②，可谓经验之谈。

调查的第一大难题，是如何进入调查现场，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并让他们说实话。备尝艰辛的李景汉深有体会：“真要把社会调查作的通办得成功，达到可靠圆满的地步，非另注重一点不可……就是如何使一般人，尤其是老百姓，接受你的调查，相信你的调查，甚至于欢迎你的调查，而达到积极帮忙合作的程度；反过来讲，就是如何使人们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你的调查。如其不然，假定你有天大的本领，你精通高深的统计，你读尽了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的中西著作，也是无济于事，倒许贻害。可是在这种人民饱尝痛苦的社会情形之下，要想使他们不说瞎话而能报告事实，尤其是关于他们的生命财产，谈何容易。”^③张闻天在调查神府县时也发现类似问题，如关于租地、典地的关系：“最难调查，农民们均不肯说实话，怕说出后会有不利于他们的事情发生。因此间政府曾禁止过典地，没收过许多不经县政府批准的典地，所以他们更不敢说。”^④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就成为农村调查的关键。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表明，大多借助了地方官员或亲朋关系的力量，有的还为农民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加强了与农民的亲和力。如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充分利用了我姐姐个人的联系。我姐姐负责蚕丝业的改革，村里的人确实都很信任她。我能够毫无困难地得到全村居民的通力合作，特别是村长们的帮助”。^⑤陈伯庄主持的平汉沿线农

①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31、334页。

② 张闻天：《神府经验调查谈》，《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293页。

③ 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自序，第6页。

④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⑤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村经济调查,“适承平汉路局美意,与以援助和便利”。每到一站,“由站长派路警随同下乡先与乡长接洽,说明来意……所到各地,十分之九,均乐于接受。而且路警和乡长平素相识,感情既通,便能相信”。^① 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更是打着行政院的牌子,有官方帮助之利。他们每到一地,都要接洽省当局、县当局,由其照会区乡协助。在土匪猖獗之地,甚至由县长带领士兵陪同。^② 在苏力看来,以上手段利用了两种资源,即正式权力资源和非正式权力资源,“是一个对求知对象的支配性权力形成和发生影响的过程,是一种征服的过程,是一个突破障碍和开拓进路的过程……甚至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③ 从当时的调查实际看,更多的是利用了正式权力资源。

张闻天的晋陕调查,也是如此。张谈到地方权力的重要性,即要“同当地党、政、军、民机关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且“从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着手,同他们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开始调查,经过他们的介绍,推广到其他的群众”。尤其在调查中一旦发现同多数群众利害密切相关的问题,更需要地方政府的帮助,“能经过当地党、政、军、民机关解决的,应帮助解决,以取得群众对调查者的信任与拥护。这对调查工作有很大的便利”。^④ 如表一所示,仅从1942年1月26日—9月25日张闻天的调查日记来看,他与地方党政干部谈话68次,涉及76人,包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河边司令部参谋长李硕来、绥远行署主任白如冰、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

① 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交通大学研究所1936年版,序、第4页。

② 参见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8—177页;《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6—91页。

③ 苏力:《法律社会学调查中的权力资源》,《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第36页。

④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41—342页。

士第以及神府县县长、兴县县长、分区委、乡支书、区长等；张闻天还亲自参与地方实际工作3次，涉及划定阶级、整顿三风、给地方干部介绍调查经验以及参加区党委讨论减租减息报告等；有的调查员帮助农民解决了实际问题。在兴县碧村，有一个姓白的大地主，每年收租大约二三百石，调查员将他的地一块块地核对，发现他用大斗收佃户的租子，“我们还应群众的要求，给他提了些意见，也算斗争了他一下”。^① 应该注意的是，在此调查过程中，调查团成员尤其是张闻天本人的政治地位对联络地方干部，是不可忽视的权威资源。而所调查农村基本为共产党控制的区域，或进行过土地改革，或实行过减租减息，不少农民从中受益，也为晋陕调查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

以上为社会调查的外部条件，而要深入内部，还需要具体的调查方法和形式。

职业社会学家的调查，大多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为指导。晏阳初认为：“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必须了解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理论以及方法与技术。”^② 他们运用了多种现代调查手段，如个案调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通讯调查、民意测验、统计分析等，因而具有浓厚的“社会学学科”色彩。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就采取了普查法、个案法和抽样法，是宏观和微观、粗与细相结合的方法。陈翰笙主持的无锡、保定调查也采用了普查法和抽样法，卜凯的7省调查、陈伯庄的平汉沿线调查采用了抽样法。它们之所以能够采用比较正规的社会科学调查方法，与其有较多的调查人才有关。如定县调查，李景汉手下经常有一二十人，还培训了一部分当地的调查员。无、保调查，陈翰笙分别组织了45人、68人的调查团，并提

① 《张闻天晋陕调查50周年座谈会纪要》，《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422页。

②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晏阳初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版，第2页。

前进行了训练。

与接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不同,共产党人的农村调查多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其中最有特点的是开调查会,即使用间接方法,通过“知情人”搜集情况。毛泽东通过亲身调查提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都高明的学校。”^①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专门就此谈到七点调查技术,如调查会到些什么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调查提纲、亲自出马、自己做记录等。^②

张闻天也采取了调查会办法,并使用了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等方法,“适当的把它们结合起来”。^③他指出:调查研究先要从村干部和党员着手,但只是经过他们,不能经常停留在那里,要从他们里面钻到社会里面去,办法就是按户调查和开调查会。^④据马洪回忆,张闻天每到一地都是住在农民家里,从一个人一个人的调查开始,然后再以村镇为单位,这样由下而上地进行调查。“记得在神府调查时住在贺家川,闻天同志几乎每一家都去过,每一家户主都亲自谈过话,调查得非常仔细”。刘英也回忆,在米脂杨家沟,张闻天“差不多连每个地主家都去了。哪一个地主开明些,他就与他交谈,交朋友”。^⑤如表一所示,仅从张闻天1942年1月26日—9月25日的调查看,召开调查会12次,与村民谈话38次,到家访谈调查10次,考察地方社会状况28次,问题广及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方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7—118页。

③ 张闻天:《出发归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41页。

④ 张闻天:《神府经验调查谈》,《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294页。

⑤ 《张闻天晋陕调查50周年座谈会纪要》,《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421、427页。

表一 张闻天晋陕调查情况统计表(1942 年 1 月 26 日—9 月 25 日)

调查方式	次数	涉及人次	主要涉及问题
与村民谈话	38	50(4 次不详)	村落党史、女巫、村情况、离婚妇女、农业生产、交租、亲属关系
到家访谈、调查	10	14(1 次不详)	典地、户口、播种器、轧花机
开调查会、座谈会	12	25(8 次不详)	村政权工作、区村政权领导方法、武委会领导方法、村干部领导方法
与地方党政干部谈话	68	76	党团、晋西北工作、反击顽固分子、政治动向、干部贪污问题、乡长职责、案件、土地纠纷、做鞋、为调查工作做准备、各阶层状况、村代表会议、精兵简政、税收、减租减息、剧团、县、乡、村概况、学校
考察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活动	28	—	集市、秧歌、印刷厂、店铺、打蘸、村党员小组会、耕地、下种、掏碳、案件审判、村群众大会、土质、地方戏、小学、水利工程、骡马大会、党校、寺庙、村干部区选大会、支差、百姓求雨仪式
参与地方实际工作	3	—	划定阶级(兴县任家湾)、整顿三风(碧村区党委)、给地方干部介绍调查经验、参加区党委讨论减租减息报告
其他	—	—	整理表格、材料整理、读农调查论著、研究当地农民家庭、研究租佃(土地及牛)情形、阅读其他调查成员的调查材料、撰写调查报告、与各工作人员座谈调查材料、召开调查员会议、研究村材料、研究晋察冀边区法令、晋西北公粮、村摊款问题,做调查报告

注：村民谈话，涉及普通农民、小学教员、商人、绅士、村长、党员；到家访谈调查包括农民、地主等。

资料来源：据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41-393页资料统计。

对以上调查方法，张闻天还提出了不少应该注意的问题。譬如，要“善于同群众接近，生活群众化，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的向他们请教。态度应不太庄严，使群众害怕；也不要油腔滑调，使群众看不起。待人和气、亲热、自然，是最主要的”。^①这与毛泽东所讲过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②是一致的。关于开调查会，张闻天强调：“出席调查会的人，一定是要可靠的人，这样可能比挨户调查还要反映真实些。”“老百姓讲话，不要去堵他，而是让他讲完，要帮助他们解决些问题。在人家讲话时，要注意提问的方式，回答的时候，要进行慎重研究，凡是调查中的东西，都要反复研究。”关于个别谈话，“谈话次数可不拘，总以问题谈清为主，但谈话时间，力求以不妨碍对方生产、损失对方利益为原则。农忙时的中午休息时间及夜晚时间，及冬天农闲时间，是最便于调查工作的。谈话不要采取像审问或填表格的形式，而以生动的、随便的，但又有一定方向的‘拉话’为好。”^③诸此原则，在调查中都得到有效的应用。

①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0页。

③ 张闻天：《神府经验调查谈》，《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294、341-342页。

四 “由个别的抽出一般的原则”

改造型社会调查的最终目的,是要研究所调查的资料,为既定目标提供指导性结论。对此,张闻天指出:“收集材料,只是调查工作的第一步,而第二步则是研究。这里材料的整理很是重要。过去调查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研究,结果浪费精力很大,得到的益处很少。”这个整理和研究的过程“是由个别的抽出一般的原则的过程(而调查是由一般到具体,到个别),把一般原则抽出来,我们的工作就结束。”^①

张闻天的研究意识很强。在调查过程中,他经常阅读有关著作。从其调查日记可以看出,所读论著有韩德章的《浙西农村的借贷制度》、冯和法的《中国农村资料汇编》、乔启明的《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布朗的《峨眉山 25 农家调查》、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的《浙江临安县农村调查》等。^②这对他研究晋陕调查资料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另有一例,也表现了他的研究性思维。在杨家沟调查时,当地最大的一家地主马维新保存着将近一百年来的各种账簿,张闻天说:“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里算资本家的‘帐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帐本子’啊!”^③也就是说,要像马克思那样研究问题。

张还提出了整理和研究资料的具体方法:一是最好能在当地即加以研究。“研究工作应该紧跟在调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在调查的地方进行。两者相隔太久,会使研究工作流产,因而不能完

① 张闻天:《神府经验调查谈》,《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 294 页。

② 由于是日记形式,有的论著名称被简化了,有的没有提作者。

③ 刘英:《我对晋陕调查的回忆》,《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 414 页。

成调查的任务”。^① 二是使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从感性方面得来的关于调查对象的统一的、笼统的印象, 必须首先加以分析, 加以解剖。如调查一个农村的阶级关系, 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分解成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 分解成为各个家庭。我们的调查就先从各个家庭开始。但一个家庭还只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研究, 我们必须继续加以分析, 如一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 等等, 然后加以个别的调查。关于‘家庭人口’一项我们仍然可以加以分析, 如儿童、壮年、老年, 儿童、壮年、老年又可分为男的、女的……经过这样的分析方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农村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加以认识”。^② 而另一方面, “分析的方法必须以综合方法来补充, 使我们时时记到我们分析出来的部分, 是一个整体的部分, 是不能脱离整体的部分。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 为研究便利暂时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的。这些部分必须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 这就是综合”。仍以上述一个农村的调查为例, “在将一个农村分解成为许多家庭, 并将各个家庭加以调查之后, 我们就应把这些家庭综合起来, 这样就可使我们知道这个村子的户口总数, 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村子, 还是一个小村子。在将一个家庭分解为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等各个组成部分, 并将这许多部分加以调查之后, 我们就应把一个家庭的这许多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研究, 使我们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阶级成分的家庭, 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家庭等等。再把不同的家庭成分综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村子所有户口的阶级成份了, 如地主好多, 富农好多, 中、贫农好多等等。这样, 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全村的总户数, 而且可以了解其阶级关系了”。总之, “分析与综

①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41-342页。

②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38-339页。

合的方法,在调查研究中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对立的统一”。^①

经过分析与综合,张闻天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理论见解。其调查成果《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土地问题研究》和《米脂县杨家沟调查》^②,无不闪烁着智慧之光。譬如,对神府县按人口平分土地(一般除中农外)的做法,他提出土地革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认为:“土地革命前,是土地所有的集中与土地使用的分散之间的矛盾。在土地革命后,则土地不但分散使用,而且也分散所有了。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经济,代替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经济。旧的矛盾(封建剥削)是解决了,这是经济发展的一大进步。然而旧的矛盾的解决,不过是新的矛盾的开始。这种新的矛盾,虽是它今天还不大显著,但必须给以研究。”“因生产单位的缩小,过去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如路家南圪的两个风车,现在均搁着不用,贾家沟也有两个风车未用。如贺家川、孟家沟、贾家沟的大部分水利,现在均已失修……独立小生产者,是难以利用这种进步的但又花钱的生产工具的。”也就是说,“小生产者的经济,同时妨碍着畜力的大量使用与合理使用。”“在独立的小生产经济下,粪的产量,大受限制的,而且也无法平均使用在所有的土地里。”^③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论断,张闻天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张闻天最有价值的见解,是“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即落后的中国农村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加快发展生产力。一是农村资本主义的

①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40页。

② 何西来在为《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做序说:“在那一代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惟一一位做过如此系统如此多的农村调查并把整理成文的著作留下来的人。”(陈桂棣等:《中国农民调查》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这一看法有误。

③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9、11、20页。

发展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前提。“农民已起分化。除富农、雇农外，农村人口的大多数，是中农、贫农小资产阶级成份，这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园地。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二是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有其必然性。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可使社会进化的”。“在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下，首先是富农经营自己土地，并雇长工。土地集中使用，而又合理分工……土地产量越高，对富农资本家越有利（所以他们不象地主那样对生产漠不关心，当寄生虫），对全社会更有利”。三是发展资本主义，不怕农民受苦。“不要怕晋西北资本家多。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一个雇工，垄断不到一百垧山地，这有什么不得了呢？……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为此，“不要怕农民受苦，就是说，不要怕雇农多，没法安插，失业，工资低，生活恶化。今天雇农、贫农的生活，都是很苦的。说贫农永远比雇农生活好，贫农不要丢失土地当雇农，这是落后的想法。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的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只要资本主义发展了，工人生活一定会改善”。四是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有所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中国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

来一阵,会弄糟糕的”。^①五是三分封建主义七分资本主义。“继续削弱封建主义,但必须容许部分封建主义之存在”。“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三分封建主义七分资本主义”。^②

应该指出的是,张闻天的这一主张并非他的发明。“延安农村调查团”出发不久,1942年1月28日、2月4日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文件指出:党的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但可贵的是,这是张闻天通过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它不仅证实了中央的政策,而且从宏观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做了更为深刻的诠释,“对于完善我党解放区土地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③也正因为此,才实现了此次调查的政策服务目的。

五 余论

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村调查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干预色彩。譬如:有的认为毛泽东做的调查,是政治学的调查,阶级斗争式的调查,在田野调查之前已有设置好的阶级对立的理论模式和爱憎分明的情感模式,其阶级分析方法有理论上先入为主的嫌疑和简单化倾向。^④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调查都或多或少受到主观情绪上“反帝反封建”的影响,意在宣传“反

① 张闻天:《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22-324页。

②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88页。

③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编后记,第430页。

④ 周大鸣:《田野工作的情感》,《思想战线》2002年第4期,第59-60页。

帝反封建”，倡导社会变革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他们采用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分类方式，且又不对所用的分类术语做出明确的定义，影响了这些调查资料的学术价值。^① 还有学者对土地分配集中的结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各阶级的分配比例缺乏足够的证据，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似乎是人多地少。^② 更有学者通过对杨家沟村的人类学跟踪调查，认为张闻天“延安农村调查团”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分析法”有一定的局限，即杨家沟人的实际感受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社会生活脉络中的“生活关系”。农民有着属于自己的“阶层”意识，即“贵族”阶层并非只是由对财富的获得过程来决定，它还必须经历如何处理这些财富以及人们对此如何评价这一过程。这样，对“贵族”阶层的理解也就包括了“生产关系中的地主”和“生活关系中的地主”，“阶级”概念经过农民自己价值观的“过滤”。“地主集团”内部极为复杂，相互之间往往形成鲜明的对照，政治态度上出现“红白”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这些已经不能用经济基础来说明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和决策”，对阶级的解释还存在着非纯政治、非纯经济的一面，“分析生产关系时同样不能离开社会生活的网络”。^③

我们以为，以上看法有助于加深对农村和中国革命史的理解。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村调查的确或多或少存在着以上学者所提出的问题，然而不能因此轻易贬低或否定这些调查的理论、方法及其成就。

如前所述，调查分为认知型和改造型两类，但无论何种类型，一般都离不开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共产党人的调查是最为明显的

① 张丽：《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第6页。

② 阎明：《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第201页。

③ 罗红光：《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第32、46、53-54页。

改造型,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是为革命服务和政策服务的。而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调查的目标和任务,势必以生产关系和阶级分析为前提。也就是说,既然是共产党,既然目标是革命,既然是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那么其所有的行动包括农村调查都带有鲜明的革命特色。因此,就其做法本身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否则还叫什么革命?况且,这些调查本身仍大体反映了农村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张闻天的晋陕调查,“都具有各自的典型意义。从地域上来看,陕北、晋西北农村是我国北方农村生产力落后的地区,因此神府县和兴县的调查报告以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详细考察内容,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国情资料;从动态上说,当时两个地区都在不同程度地经历着重大的变革,因此报告从实际得出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情况,又为人们研究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了切实的依据”。^① 尽管此次调查以生产关系和阶级分析为主要理论,但我们并未发现突出的脸谱化痕迹。张闻天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给出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著名论断,符合中国社会的基本实际。他对地主阶级的分析也比较辩证公允。马维新是杨家沟村最大的地主,张闻天一方面揭露了他的剥削本性,“他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他的地主经济的利益。他对农民的一切剥削,都是认为当然的,无容置疑的。”同时,也表现了他善于经营和生活节俭的一面。“他从十八岁起一直到现在,管理着他的经济。并且发展了他的经济”。“他治家极精明,不任意花钱。只在子女求学费用上,他不惜大量支出。他个人无抽烟喝酒嗜好,早起早睡,终日忙碌。因此,在他当家时期,差不多每年收支相抵均有盈余,使他能够不断的以此做放账置地的资本。所以他的经济一

①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编后记,第431页。

直到一九三三年均在向上发展的过程中”。^①对地主阶级的这一评价,实际上已有“生活关系中的地主”的意味,远比一些革命者眼中的“恶魔”客观得多。

总之,历史评论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不管做什么类型的调查,只要态度认真,深入实地调查,反映基本社会事实,都有各自的意义和价值。其目的无论是为了提供社会实况,还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社会的方案,抑或为政府的政策法规提供依据,皆无可厚非。那种认为非得纯粹学理的调查才是真理,或者相反,只有阶级分析的调查才是科学的,都是一刀切的做法。也就是说,调查不可能统一为一个模式,不能以自己的调查而否定另外的调查,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问题恰恰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不同的农村调查流派就有这种相互否定的倾向。即使到今日,面对同一调查资料,利用者不同,也竟有大相径庭的价值判断,颇值得我们注意。我以为,“抱理解之同情”永远是研究历史的指针。

(作者 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邓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张闻天:《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25、31页。